

《20世纪的中国人》丛书

浴血

萧少秋 著

中国人

穆宪 宗光耀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世纪的中国人》丛书

浴血——中国人

萧少秋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1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50册

ISBN 7-80049-676-7/D·51 定价：2.00元

前 言

20世纪是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世纪，也是辽阔的中国大地出现巨大转折的世纪。

20世纪的中国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由一个背负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重压、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成为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令世人瞩目的民族。

为了实现这一巨变，无数志士仁人探索、奋斗、牺牲。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终于领导中华民族赢得了彻底解放。

解放了的中国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出许多辉煌的业绩，叩开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之门，整个世界为之翘首。

如今，改革的浪潮把中国人推向一个新时代。改革使中国人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并把一个初具繁荣的共和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20世纪中国人的历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人的苦难与抗争，求索与奋进，创业与搏击，无不可歌可泣，激励今人，昭告后世。

我们用饱含激情的笔，为20世纪的中国人立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弘扬，对先辈业绩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群英结党救中华	5
一、共产主义者的集结	5
二、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18
三、从革命党到共产党	24
四、仗剑拯民于水火	26
第二章 立足于大地的安泰	29
一、劳工神圣	29
二、红旗卷起农奴戟	38
三、铁血战旗扬	42
第三章 血染神州	57
一、1927——鲜血浸泡的年头	57

目 录

二、从血泊中奋起	65
三、寒夜火种	79
四、收拾金瓯一片	86
五、铁流万里	94
第四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09
一、白山黑水战马鸣	109
二、血肉长城	117
三、砥柱中流	131
第五章 两种命运的决战	137
一、黑云压城城欲摧	137
二、拼将热血灌春花	143
三、天翻地覆九州红	147

楔 子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冲。

夜深沉，万籁俱寂。吃了两次安眠药，毛泽东仍然无法入睡。他让卫士拿来纸笔，靠在被子上涂了写，写了涂，时时喃喃自语。写着写着，毛泽东的眼圈微微潮红。他动感情了，写下这样一首诗，一首积满了32年情愫的《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自古以来，英雄还乡，常常给历史留下一段段佳话。此前2154年，农家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回到家乡沛县，欢宴父老，慨然而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企盼能有如云的猛士效忠于汉家朝廷。

两千多年后，同样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这位极重感情极恋旧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回乡的这个夜晚，充塞胸臆的是红土地上32年前卷起的狂飙，是汨汨渗入中华大地的两千万英烈的鲜血。在这片热血当中，也有他六位亲人的血。

倒在三湘四水这块土地上的有杨开慧，毛泽东的第一位夫人。这位恩师杨昌济先生的掌上明珠曾慷慨解囊，拿出父亲的奠仪给毛泽东作建党的活动经费。她是毛泽东的伴侣，也是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党员，和毛泽东一起在长沙、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927年秋收起义才分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杨开慧留在长沙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身后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毛泽东一生没有忘记杨开慧。1957年，他写诗称杨开慧为“骄杨”。1962年，又向友人解释为何称“骄杨”，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在杨开慧牺牲的前一年，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这个年仅24岁，但在湘南小有名气的女游击队长在湖南衡山英勇就义。据说，70年代风行的《杜鹃山》一剧中，游击队女政委柯湘的人物原型就有毛泽建的影子。

在十年土地革命中，毛泽东还失去了小弟弟毛泽覃。毛泽覃比毛泽东小12岁，是毛泽东亲自带进革命队伍的。他1923年入党，在湖南水口山、长沙等地搞过工运，在广东黄埔军校、省农协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做过工作，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转战湘粤赣交界山区。上井冈山后，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搞过基层建党工作，从游击队党代表

一直做到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兼政委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王明路线时，毛泽覃和邓小平、谢唯俊、古柏一起被打成“反党派别”，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撤职送农村劳动改造。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红军独立师师长，和项英、陈毅一起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在福建长汀、瑞金边界处的一次突围中阵亡，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年仅30岁。同年，粤赣边区游击司令古柏、陕北靖边特区特委书记谢唯俊在作战中阵亡。“邓、毛、谢、古”唯邓小平一人幸存。

毛泽东的另一个弟弟毛泽民于1943年牺牲，当时在新疆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只比毛泽东小3岁。从1921年起就帮助哥哥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入党。此后，到安源搞过工运，回韶山办过农民夜校，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1932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1938年，奉命到新疆工作，先后担任财政厅和民政厅长。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共，逮捕毛泽民等100余名共产党员。狱中，毛泽民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竟被刽子手用麻绳活活勒死。同日殉难的还有曾当过中共“一大”代表的陈潭秋和《囚徒歌》作者林基路。毛泽民一死，毛氏三兄弟只剩下毛泽东一人。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覃的儿子，19岁的毛楚雄在1946年的中原突围中牺牲。4年之后，毛泽东的长子，28岁的毛岸英又战死在朝鲜战场上。

在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像毛泽东那样痛失同胞手足、爱妻子侄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知有多少。周恩来不止一次讲过自己是幸存者。凡是从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走出来的都是幸存

者，他们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讲得出有哪些同志、战友、亲人倒在自己的身边。而今，这些两鬓皤然的老人常常思念那个艰难的岁月。他们的后人，新中国的每一代公民更不应该忘记在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人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才使东方巨龙昂起了头。

第一章

群英结党救中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已是众所周知，人所公认的了。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如她的政敌所说的那样——“是第三国际制造出来的，不合中国国情的怪物”呢？共产主义的确是来自域外的思想，但中国共产党人却始终是土生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民族儿女，是为拯救中华而聚集在一起的民族精英。

一、共产主义者的集结

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无论如何无法回避这样两个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前者因为后来成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差一点被从党的创始人之中“开除”出去。近10年，才逐渐受到公允的评价。后者63年前英勇就义，然而其在北京西郊的墓园也是近些年才修葺一新的。

人们不应该遗忘他们。

1. 出身于望族的斗士——陈独秀

时至今日，“陈独秀”三个字不再仅仅是葬送大革命的祸

首、机会主义路线的代名词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然而，这个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早年生活道路和无产阶级毫不沾边。他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宦宦之家，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逆子。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论年龄在中共创始人中居于第二，仅次于1875年出生的何叔衡，比毛泽东等人大了十几岁。论资历、声望则是只做过中学教员的何叔衡无法相比的。这些也许成为后来陈独秀以老子自居，听不进毛泽东、蔡和森等后生小辈的意见的一个因素。作为安庆望族“义门陈氏”的子孙，少年陈独秀只能走父辈兄长规定下的科举仕途。1896年，17岁的陈独秀考中了秀才。次年，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能考上举人。

科举落第使他亲身体验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后来，他回忆这一经历时说：这三年一次的抡才大典不过找来一帮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升官发财的聚在一起，表演一番，如同一次动物展览会。从此，自己开始“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抛弃了“由举人、进士、状元郎”的理想，走上了“康党、乱党、共产党”的人生道路。

陈独秀绝意科场，转习新学。先入杭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学法语和造船，后东渡日本读师范。他一面求学，一面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先后在安徽和日本东京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中国青年会”、“爱国会”等团体。1903年，在上海参加了章士钊主办的《国民日报》，进行反清宣传。次年，该报因经费问题停刊后，陈独秀回安徽芜湖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员，创办《安徽俗话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社会各

界宣传爱国思想。他曾撰文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痛心疾首地说：“我们黄帝老祖宗丢下来几千年的好江山，到了今日子孙们无用，糊里糊涂的让了外人。”（《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8期）他还痛斥君主专制，说：“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的国家”。国家“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安徽俗话报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进步报刊。

1904年夏，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到上海参加了暗杀团。11月，蔡元培等人将暗杀团改为光复会，陈又成为该会会员。1905年8月，《安徽俗话报》因得罪英国驻芜湖领事馆而被迫停刊。也就在这一年夏天，陈独秀联络柏文蔚等人组织了秘密反清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同年冬，陈独秀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起草檄文多篇、传单多张，广为张贴。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因参加“二次革命”，遭到北洋政府通缉，被迫逃往上海，再转日本。在日本，他参加了黄兴、章士钊等人的“欧事研究会”，继续探索救国之道。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15日，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大声疾呼：“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认为青年一代负有拯救祖国的神圣责任。而拯救这个古老的中华，“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高高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新青年》内容新颖，思想深刻，文字浅显，在各界，尤其是青年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行量迅速从1000册猛增

至16000册。五四时期的不少青年是从《新青年》上了解到救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对张昆弟、蔡和森等人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转引自《陈独秀年谱》）就是在陈独秀离开共产党之后，毛泽东仍不讳言陈对自己的影响，他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指陈独秀）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同上）

陈独秀声望日隆，1917年1月15日应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7人组成编委会，每人轮流负责一期。同年3月，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3号上撰文歌颂十月革命，“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18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他和李大钊等人一起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继续关注和宣扬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离京。不少人劝陈独秀离京避祸。他毅然表示：“我脑筋疼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之社会。”（《年谱》）陈独秀留在北京，继续用他的笔英勇战斗，连续发表文章说：“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为政客利用煽动，……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样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该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22号）为推动各界支持学生而大声呐喊。

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举行罢工，声援学生，“五四”运动进入新阶段。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25号上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社论。指出：“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0日，陈独秀亲自到中山公园等处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次日，又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被警察厅逮捕。

陈独秀被捕后，各界人士纷纷通电抗议，进行营救。孙中山先生在与北洋政府代表会谈中，要求释放陈独秀，以明诚意。李大钊在《民国日报》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表达对陈的敬意。“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要求尽快恢复陈独秀的自由。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逮捕监禁“决不能损失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迫于各方压力，北洋政府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切身感受到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出狱后，于12月1日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如今20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从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和坚定的民主斗士，转

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他那种不安于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的社会地位，毅然背离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运动的牺牲精神，是本世纪初进步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2. 幽燕多奇士——李大钊

在新文化阵营中和陈独秀并肩作战的李大钊有着和陈不同的经历。他比陈小10岁，是河北乐亭人。其家虽是地主兼商人，但远非“望族”，而且到李大钊成年时，家境已彻底败落。李大钊读过四书五经，但未参加科举考试，上的是新式学校。所以，他思想中新的因素要比旧的成份强烈得多。

1907年，李大钊在永平中学毕业，靠夫人赵纫兰挪借、典当才得以到天津求学。他先考上长芦银行专修所，但因“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狱中自述》），改投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在该校的6年里，李大钊广泛涉猎新学，思考辛亥革命之后动荡的政局，一次又一次地为爱国志士和无辜同胞惨遭迫害而忧心如焚。

1913年冬，李大钊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活动。1915年，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对，李大钊所在的留日学生总会积极支持云南护国军。次年春，他送友人回国，赋诗一首，云：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表达了迫切希望回国参加讨袁的心情。当年四五月间，李大钊未等毕业便毅然回国参加斗争。

袁世凯垮台后，李大钊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于1916年夏

到达北京，先主办《晨钟报》，后担任《甲寅日刊》编辑。次年7月，张勋复辟，李大钊为避迫害仓促离京，寄寓于上海。在此期间，他一面坚持不懈地反对尊孔复古，宣传民主与科学，一面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是遭受挫折而苦闷，但始终没有丧失前进的信心。1917年10月10日，他在纪念辛亥革命六十年的文章中说：“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所以，尽管革命6年以来屡遭挫折，革命者仍应“勿稍怠荒，同异岁新，与时俱进。”（《李大钊选集》第90页，92页）

怀着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除了在报刊上和公开讲演中盛赞俄国十月革命之外，还在同年冬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把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组织起来。这个研究会虽未及发展便遭查禁，李大钊仍通过各种办法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自己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3. 群英结党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为此必须有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20年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开始酝酿组织共产党。这时，出狱不久的陈独秀为躲避迫害，决定离京前往上海。2月，

李大钊送陈出京，直至天津。途中，两人商讨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3月，李大钊和北大学生、“五四”积极分子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也就是在这个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魏金斯基、翻译杨明斋等来华。魏金斯基等人先到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就建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和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建党问题。

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8人发起成立了共产党。9月，北京的张申府陪同英国学者罗素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中，两人一致认为应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党的组织。

9月下旬，张申府回北京，将与陈独秀商量的结果转告李大钊。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3人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北京小组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人。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在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影响下，武汉、长沙、山东、广州以及旅居国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开展了建党活动。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武汉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的利群书社就和《新青年》杂志社、少年中国等社团有密切的联系。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湖北人董必武在上海居住期间和李汉俊是邻居。上海党组织建立后，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等人，要他们组织起来。后来，李汉俊又亲自到武汉找董必武谈建党问题。与此同时，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刘伯垂由广东回武汉。途经上海时，由陈独秀吸收入党，并派他回武